

论台湾高山地区的史前聚落

——以曲冰遗址为例

陈仲玉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香港)

内容提要:台湾的史前遗址多达二千三百余处,普遍分布在各大小溪河流域中,并且多顺着河流延伸入高山地区。遗址的面积大多有数公顷,甚具规模,显然多是族群的聚落。关于台湾先民深入高山的原因,学者们常有不同的看法。或说是因族群成长,人口产生压力;或说某些族群因逃避某种疾病(如疟疾)。先民们之所以选择较高的山地,原因有四:一、迁入移民优先找寻适合于他们生活的生态环境;二、族群社会结构的生态取向;三、回避“瘴疠之气”;四、族群繁衍的扩张。

关键词:台湾高山地区 史前遗址 史前聚落 曲冰遗址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一 前言

台湾的史前遗址多达二千三百余处,普遍分布在各大小溪河流域中,并且多顺着河流延伸入高山地区。这些遗址的面积大多有数公顷,甚具规模,显然多是族群的聚落。史前先民会在怎样的情况下舍平原丘陵而深入高山?他们又是在什么时候将整个族群迁入山区?这些问题自笔者从事高山考古之后,即常萦绕脑际,本文将就此提出讨论。

关于台湾先民深入高山的原因,学者们常有不同的看法。或说是因族群成长,人口产生压力而迫使某些族群只有往山区推进;或说某些族群因逃避某种疾病(如疟疾),因而深入高山。诸如此

类,均是本文探讨的话题。

二 史前遗址在高山地区的分布

何谓“高山”?它的高度应该多高?学界尚无定论,地形中的高度本来就有绝对高度与相对高度的概念。依台湾行政机构对山地的解释,100米以上称山地,1,000米以上始为高山地区。但若依地理学者陈正祥的地形学观念,山地与丘陵的分界是以绝对高度500米为划分标准。台湾地形上以海拔500米等高线为一极重要的地理界线,并且此线大致与相对高度500米的等高线相符,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此一混合高度线可视为台湾山地与丘陵的分界,此线以上便是山地。台湾的山区范围面积达17,500平方公里,约占全省土地面积49%^[1]。

表一// 台湾高山地区史前遗址河流流域分布统计

河流	遗址数(个)	百分比(%)	河流	遗址数(个)	百分比(%)
大汉溪	19	6.60	楠梓仙溪	37	12.85
后龙溪	15	5.21	荖浓溪	50	17.36
大安溪	58	20.14	立雾溪	4	1.38
大甲溪	45	15.63	乐乐溪	4	1.38
浊水溪	23	7.99	其他	10	3.47
曾文溪	23	7.99	合计	288	100.00

收稿日期 2009-01-04

作者简介 陈仲玉(1935~),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台湾考古学、中国史前考古学、东南亚古代史。



图一// 东埔一邻聚落,海拔 1140 米

因而，在本文的讨论中即将史前考古遗址的基准高度设在海拔500米,即本文所列所有遗址的最低高度均在海拔500米以上,共计288处,全部都在台湾本岛。其分布情形基本上用河系流域做数据的区域分划,谨将统计数据列于表一。

表一所列的统计数，仅是2009年已列在计算机文件的数据和刘益昌的最新田野资料。事实上，并不能反映实际的考古遗址之分布情形。其一，出现遗址最多的是大安溪流域和大甲溪流域，这是因为两流域经过刘益昌等人的调查，其用力颇多的缘故。再者，是荖浓溪和楠梓仙溪，有刘益昌、陈维钧等人的长期调查和研究。其实浊水溪因有“浊大计划”的研究，发现的遗址很多，但多在该流域的中下游地区，上游河谷笔者30年前虽有调查，但仅是初步的阶段。后来因忙于曲冰遗址的发掘和其他研究工作，便无暇再深入调查。曾文溪流域的情形亦很类似，该流域的中下游有臧振华的调查工作，也未能深入上游地区。这是台湾西部的情形，至于东部地区，因山地地形的因素，或是早期移民多先西而东的趋势，也有工作未及的遗憾。原来遗址就少也是原因。

资料中独少大肚溪上游的情况，事实上笔者早在20年前调查浊水溪上游时，即曾到达北港溪上游的南投县仁爱乡发祥(瑞岩)、力行、红香一带,发现的史前遗址不下20处。但是,资料堆积至今尚未整理发表。所以,除了这288处史前遗址之外，尚有未调查过的地区和已知的遗址而尚未发表登录者。

此外，在已知登录的遗址中也有若干因天灾或人为土地开发而消失者。例如2000年九二一地震之后，笔者曾经回到浊水溪上游河谷勘查灾后这段河谷的遗址情形，在现场亲眼目睹到Danginon遗址全毁于山崩之中,整处遗址被埋在厚实的泥石流之下。Nogan遗址的东侧有2/3面积亦遭遇同样的命运。2009年的台风重创高屏溪上游,因道路不佳,目前史前遗址尚未调查,情况不明。天灾也许仅是少数的意外，而高山史前遗址被重机械挖土开地时毁损,则为数较多。

如果将各遗址所在位置的高度分布做统计，它们的分布情形如表二。

依据这项统计,高度在海拔500~899米之间的遗址约占3/4,有74.30%的遗址在500~999米之间,1,000米以上者占25.70%。最高的一处遗址是位于台中县和平乡的志乐溪遗址,海拔3,100米,可惜这遗址没有碳十四年代，不知是何时迁到那么高的地点。

三 高山史前遗址的形态

本文所列的288处史前遗址,可能包含多种不同性质的遗址,例如聚落、耕地、猎场、墓地等等，实是很复杂的课题,需要更多研究。其中聚落是主体,最受关注。今以曲冰遗址为例,论述距今3,000多年前浊水溪上游河谷的聚落，并由此推及当时的族群规模及他们的生业状况。

曲冰遗址是笔者于1980年在浊水溪上游河谷做考古学调查时发现的，同时发现者尚有另外的18处遗址,该遗址最具发掘潜力。经过三个阶段的

表二// 台湾史前遗址海拔 500 米以上的高度统计

海拔高度(米)	遗址数(个)	百分比(%)	海拔高度(米)	遗址数(个)	百分比(%)
500 ~ 599	43	14.93	1,100 ~ 1,199	10	3.47
600 ~ 699	57	19.79	1,200 ~ 1,499	12	4.17
700 ~ 799	78	27.08	1,500 ~ 1,999	3	1.04
800 ~ 899	36	12.50	2,000 ~ 2,999	2	0.70
900 ~ 999	29	10.07	3,000 ~ 3,199	1	0.35
1,000 ~ 1,099	17	5.90	合计	288	100.00

表三// 各河流域高山史前遗址的年代

河流流域	年 代(BP)	河流流域	年 代(BP)
1. 横溪(阳明山)	2,000 ~ 200	8. 陈有兰溪	2,400 ~ 900
2. 大汉溪	2,500 ~ 300	9. 曾文溪	3,000 ~ 400
3. 马武督溪	2,500 ~ 500	10. 楠梓仙溪	2,000 ~ 200
4. 大安溪	3,000 ~ 300	11. 荖浓溪	3,000 ~ 400
5. 大甲溪	3,500 ~ 300	12. 立雾溪	2,400 ~ 300
6. 浊水溪上游	3,400 ~ 1,000	13. 乐乐溪	3,000 ~ 500
7. 乌溪	3,500 ~ 1,000	14. 新武吕溪	3,500 ~ 1,500



图二// 曲冰遗址的居屋遗迹



图三// 曲冰遗址部分墓葬群

发掘工作,已发掘面积3,700余平方米,遗址的中心主要部分已经揭露。同时出土二万八千余件石器与十一万余件陶器与陶片。

遗址所在的这段河谷,两岸的山脉高度都在1,500米以上,其东的倚背之地横亘着3,000米以上的中央山脉。年降雨量均在2,500毫米以上,因此浊水溪长年不息,两岸的支流也多溪涧泉水。年平均温度17~18℃,再加上谷地有恒定的山风和谷风,所以这段河谷气候舒适,动植物资源丰富,自然生态环境良好。曲冰遗址即在这段河谷的一处高位河阶地上,阶地与河床比差120米,海拔923.9米。此遗址已发掘的部分,有一处可以完整展现古代的村落(图二)。居屋群的遗迹可从竖立地上的板岩立柱和板岩铺地等残迹观察。居屋的模式主要可分成二大类:第一类的主结构用板岩立柱,可能以木材为辅。所有的外墙墙基均加板岩支撑;第二类的主结构可能全用竹木材料,而以板岩辅助墙基。

地层上显示这两类房屋有时间上的先后次序,第一类房屋早于第二类。在发掘中房屋遗迹普遍有二层、甚至二层以上房基重叠的现象。可知该

地点的古代居民至少曾经有二次以上的迁徙和占居。由碳十四的年代学证据,第一次占居可早到距今3,400年,晚约距今1,000年。再就房屋规模来说,早晚二期的房屋不但在结构上显然不同,单位居屋面积也有差异,早期房屋的平面面积约在40~55平方米之间,最大的一座房屋包括主屋、边屋和附属的石器作坊,总面积达126平方米。晚期的房屋面积约在30~40平方米,最小者仅22平方米。推测此史前聚落的全盛期大概会有首领与大家族10户,每户以10人计,小型核心家族20~45户,每户以5人计,全聚落人口约175~200人。聚落的房屋配置,大型屋在中心,成行地排列,小型屋围绕在外围,似乎已有社会组织形态。

在居屋群的遗迹之中,还发现有墓葬(图三),葬具皆为石板棺。棺是长方箱形,方向以东西向为主。但因年代久远,棺中均无人骨遗存。172座墓葬中,仅有一座特殊墓葬出土2件石块,其余171具石板棺中皆无任何陪葬品。婴儿葬的小型石板棺有室内葬的现象。

石器工业是曲冰文化的特色之一。居屋群中一大型石器作坊的发现显示,此处古代村落的社



图四// 曲冰遗址的石器作坊遗迹

会组织已经有某种程度的行业分工(图四)。石器的制作、打制与磨制均有成熟的发展。打制石器以石斧的形态变化最多,其次为石刀。大型的石斧与石刀显然是开发山林与农耕的重要器具。磨制石器中的投掷器——石矛与石簇之数量也很多。即使打制石器中也出现少数粗大的石矛,可见当时的狩猎活动也是生业的重要部分。磨制石锛大量出现,并且大多数均经过强力使用消耗或残破,可知是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繁的器物。这类石器大多已经残破而又经修整改造,尽量延长使用期限以节省石材。石材多属蛇纹岩或变质泥岩,并有数量众多的台湾玉材,产地多在中央山脉的东侧而非曲冰遗址附近。据此推测,曲冰人很可能是通过与其他地区族群的交易取得这种石材,亦可能再转销西部地方。石网坠均属两缢型的类型,器形小,数量不多。因聚落的地点紧傍浊水溪,使用小网的渔捞活动应该也是生业的一部分。

大致说来,这是一处台湾山地型的史前聚落。约在距今3,400年初成,延续有2,000年之久。聚落的规模不大,全盛期的人口也仅在200人左右。依聚落中房屋配置情形,以及石器作坊的出现,显示有一套社会组织系统和某种人力分工^[2]。

综观这处聚落,三千多年的先民能不计艰难,深入高度将及一千米海拔的山区。他们找到这样一处阶地,与河床比差120米,可免水泛;地势扼要视野良好;阶地之旁的小溪,泉水终年不息;其下仍有二层较低的阶地适于耕作;河谷两岸的山林更是广大的森林猎场;阶地下方的浊水溪可网捞鱼虾。在这深山纵谷中,自成一处隐蔽的居地,可以与人无争,如世外桃源。

四 高山地区史前遗址的年代

在这288处遗址中,若干遗址有年代学的证

据。大多数是碳十四年代鉴定。以台湾各河流、包括若干大河支流流域划分,汇集成各河流流域的遗址最早和最晚的年代,如表三。

诚如在第二节所说,在山区考古遗址的普查工作做得不够,不能普及做到各河流流域在共同水平的程度。表三所列的年代仅供参考。只能说某河流流域有多早的年代学证据,但不足以比较各流域的开发先后等问题。

五 高山地区史前聚落形成的原因

曲冰遗址是台湾高山地区典型的一处例子,而类似的遗址可能尚有多处。因而令人想到3,000多年前,是什么原因促使史前的族群迁移深入高山。由于考古学的证据仅是呈现若干事实,不能直接回答我们的问题,因此,也许要先从人类学、民族志方面的数据找寻线索。

历来讨论有关台湾土著民族进驻山区原因的学者,大致可以分为两派。第一派以早期日本学者鹿野忠雄为首。鹿野氏曾于1942年发表一篇文章《台湾原住民族之人类地理学的研究序说》。他认为台湾土著自西海岸的肥沃平地迁移进入深山区有四种原因:

(一)中国大陆的汉人占据了西部平原,而他們有着压倒性的优势文化力量,逼迫原先居住在平原的土著族群遁入山区。

(二)在中国人与欧洲人有关台湾土著族群的记载中,平埔族曾经有过人口繁荣的记录。虽然他们与山地土著族群同属马来种,但是其文化水平较高。因为他们先占据了台湾西部平原区,因而压制后来迁徙而入的族群往山区发展。

(三)现在居住山区的族群,本来就是农耕民族,然而在旧时狩猎也很盛行。这一点可以从他们与狩猎有关的祭祀不少于农耕的祭祀中推知。狩猎活动是他们获取食物的重要手段。但由于平原地区的猎物逐年减少,为了追寻野兽,他们逐渐进入深山。

(四)主动移入山区的另一重要原因可能与农耕技术有关。台湾原住民的农耕技术,基本上是山田焚垦。先烧森林,再开辟成耕地,以种植小米、旱稻、稗、黍、甘薯、芋和各种豆类。几年后土地贫瘠,便重新在附近另外烧垦原始林。当人口繁衍时需要更多耕地,因为追寻原始林而入山。^[3]

鹿野氏这四点考虑,基本上是以人口压力为论点。第一点连鹿野氏自己也认为离事实很远。因为汉人大量移民来台湾仅是最近三四百年的事,早于这年代,台湾的山地已有土著居民。但另一位

日本人类学家宫本延人在1953年的文章中仍持此说^[4]。今以曲冰遗址的年代为据,其3,400年的历史更证明此说的不实。其实汉人在台湾西部平原开拓的过程之中,确实迫使若干平埔族的族群往山区迁徙,但他们仅是迁入某些丘陵或是东海岸地区,而未曾进入深山。譬如台南地区西拉雅族即迁移入台东海岸。鹿野氏的第二与第四点思考,都是以平原的居民不足与耕地需求的扩张为出发点,与实际情形有甚大的差距。按台湾西部平原的人口与土地的使用率,以17世纪荷兰占据时期至清代初年期间的文献记载,台湾诸地区均没有拥挤的现象。荷兰人占据期间的1647、1648、1650、1655诸年的平埔族人口均在四万至四万八千人之间^[5]。台湾西部平原与丘陵,即原来平埔族的居地,大约以一万平方公里计算,每平方公里的平均人口尚不及5个人^[6]。平埔族分布在嘉南平原的村落多以集村为主。一个大社可附有数个小社,自成一个大小区,其人口往往超过1,000人^[7]。其时在台南附近的西拉雅族有四个大社,即所谓“四社番”。小区是点状局部的分布,整个地区仍然多空旷荒野的景象。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郁永河来台湾后所著《裨海记游》一书,所记自台南到淡水一路的情形“特以深山大泽,尚在洪荒、草木晦蔽,人迹无几”^[8]。可知他所见的西部平原仍多荒野。

至于鹿野氏第三点考虑——因寻找猎物的原因而迁徙入山,也有可商榷之处。因为在17世纪以前,台湾西部平原野生动物资源仍很丰富。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陈第著《东番记》云:

兽……有熊、有豹、有鹿……山最宜鹿
俟俟,千百为群……冬,鹿群出,则约百十人
即之。穷进既及,合围衷之。镖发命中,获若
丘陵,社社无不饱鹿者……穷年捕鹿,鹿也
不渴。^[9]

瑞士旅行家哈波得 (Albercht Herport) 1669年出版《爪哇、台湾、前印度及锡兰旅行记》,在该书1662年篇《台湾的丰饶》条下云:

在台湾没有像在其它印度诸岛那么多
有害的动物。很少蛇,没有鳄鱼;而有不能相信
那么多的鹿,不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能得到食物。
鹿都强壮肥胖,每年被中国人及台湾土人打死
的和活捉的不计其数……台湾也有很多野马、
水牛和野猪,家畜也很多,如牛、羊、猪等。^[10]

荷兰阿姆斯特丹1675年出版的《被遗误之台湾》,作者署名C.E.S.,学者们推测可能是荷兰在台

湾最后一任长官揆一(Freedric Coyett)。该书云:

也有许多野兽,尤其多鹿,比得任何其它国家中的产量……也有野猪、野山羊、兔、家兔、野猫、guinea fowls、鹧鸪、鸠、大鹿(elk);也有危险的及有毒的动物,例如狮子、大蛇等。^[11]

郁永河在《裨海记游》中说:

前路竹塹、南嵌山中野牛甚多,每出百千为群,土番能生致之,俟其驯,用之……途中遇麋、鹿、麝逐队行,甚伙,驱獫狁获三鹿。^[12]

荷兰人据台期间,产自台湾的鹿皮与鹿脯是出口的大宗之一。以鹿皮销日本,有时一季(3个月)五万多张,最多的年销量有十一二万张^[13]。《巴达维亚城日志》1625年4月9日记载:“据闻鹿皮每年可得二十万张,鹿脯及鱼干甚多,可得相当数量之供给。”^[14]由上述文献可知,17世纪台湾西部平原仍有甚为丰富的动物资源。

鹿野氏的第三条分析的情形,在17世纪大量汉人移民来台以后,在某些地区的土著族群确实发生过。譬如南部有西拉雅族内迁楠梓仙溪与荖浓溪流域;马卡道族迁高屏平原;中部的巴宰海族迁入埔里盆地,邵族迁入日月潭等例;又如高山地区浊水溪上游泰雅族赛德克群因寻找猎场越过中央山脉而进入立雾溪流域,始分支为东赛德克群(今称“太鲁阁族”)都是很好的例子。然而在17世纪以前的台湾,类似的人口压力和族群被迫迁移的情形,似乎没有史学上的证据。即使发生过,也仅可能在若干平原边缘的丘陵地区。对于早在三千年前,深山纵谷中,如曲冰遗址的例子,则鹿野氏所考虑的诸点理由就不具说服力。

第二派则主张美国考古学家狄丽梅(Judith Treistman)于1972年在《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台湾高地的史前史》一文中提出的看法,认为台湾史前聚落可以分成两种东南亚特质的生态适应模式:一种是山地的山田烧垦,另一种是平原的稻米耕作^[15]。陈奇禄也有类似的意见,他于同年十二月的一次“台湾文献学术座谈会”发表题为《关于台湾土著文化的几个问题》的演讲,认为台湾土著人居于山地的原因和东南亚各地的山地民族一样,因为他们从事山地耕作。山耕适合于山坡地,所以台湾高山族在到达台湾的时候,便择居于山区。

上述二派的论点,似乎均未说到重点。其一,鹿野忠雄的人口压力说不具说服力,因为据17、18世纪的史籍记载,其时台湾西部平原仍然是地广

人稀,物产资源丰盛。其二,山地生态适应于山田烧垦说并未解决先民们为何深入高山的问题。尽管烧垦是台湾先住民在山坡地农耕的普遍生业,但在低海拔的山坡地,甚至有些平原地区也使用相同的耕作。

笔者认为先民们选择较高的山地有以下几种可能的原因:

(一)生态环境的需求:这种需求是因生态环境的适应,其中不仅关系到农耕生业,最重要的是生活的适应与资源利用的选择和方式等诸种差异。古时迁入台湾的移民之中有许多来自丘陵或高山地形的族群。他们本来就习惯于丘陵或山区,自然也会优先找寻适合于他们生活的生态环境。即使在迁徙的过程中,也许会先遇到各种不同的环境,但是最终会以他们理想的生态环境为依归。这情形有些类似明清以后移民台湾的客家人,他们喜居丘陵。

(二)族群社会结构的生态取向:今日吾人的观念多喜好平原而轻视山区,但在古时则未必如此。盖因平原地形的河流宽广,多冲积扇,土地肥沃,易于农耕;广袤平野,麋鹿成群,亦便于渔猎。平原地形的自然资源或许较丘陵山地丰富,但在台湾土著族群复杂,酋首风俗盛行的情况下,生活在平原的村庄则易攻难守,因而族群的社会组织要大。青壮年男子既是生业的生产力,也是防卫的主力。而山区的部落,一小群人就可以窝在山谷中。据1962年台湾各土著的人口统计,凡居住在山区的部落很少超过三百人者;但居于东海岸的阿美族与卑南族的村庄大多六、七百人,最多者达五千多人^[16]。所以,不是大型社会组织族群就不易居留平原。

(三)回避“瘴疠之气”:所谓“瘴疠之气”即是疟疾病,它自古以来即是人类的公敌。在世界各地的森林沼泽地区,往往是人类的克星。台湾地区有疟疾的记录见于康熙十七年(1663年)郁永河的《裨海记游》:

山川不殊中土,鬼物未见有征。然而人辄病者,特以深山大泽,尚在洪荒,草木晦蔽,人迹无几,瘴疠所积,入人肺肠,故人至即病,千人一症,理固然也。^[17]

可见疟疾对于地属亚热带的台湾土著族群来说是致命的。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统计,1906~1911年间,台湾人口约三百余万,因疟疾死亡者每年超过一万人,据台湾死因第一位^[18]。大正十二年(1923年)台湾的总人口约三百九十万,台湾本

岛患病经公医诊疗者331,316人,得疟疾病者64,869人,占19.58%。其中花莲港厅罹患率占该地区病患总数之33.22%,为全岛第一位,其死亡率占21.9%,也是该地区的第一位死亡病因。花莲港厅下分为三个行政区(支厅)。这三个行政区的疟疾死亡率各为花莲港支厅26.1%,玉里支厅22.7%,研海支厅8.0%。前二者地势属低海拔的海岸及纵谷地区,后者是太鲁阁一带的高山地区^[19],这是日本人执行了十五年的疟疾防遏政策之后的成果。在没有现代医学诊治的古代,这种疾病的危害更可想而知了。台湾的疟疾分布,因气候与地势不同而异,据民国四十二年(1953年)疟疾研究所调查,位于海拔50~500米、占全岛面积17%的山麓地带之学童罹犯率为50%以上;海拔1,000米以上及都市中心区、西南部沿海岸、澎湖列岛,约占17%的地区之学童罹犯率为10%以下。日人宫本延人于1953年的文章中已经提出疟疾的问题,他认为台湾高山的聚落多远离溪流,目的就是回避这种疾病^[20]。陈正祥也说,高山族之居位山区是因为山区的气候比较健康,可避免疟疾的侵害;就本省的情形而论,海拔1,000米之地,便不再有疟疾^[21]。

(四)族群繁衍的扩张:族群的繁衍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现象。每个族群之中,总会有些人不满于现实环境而冒险去另寻新天地。笔者发现曲冰文化与埔里盆地的水蛙崛遗址文化相当类似。那是台湾中部史前使用素面红陶的族群,有一支先进入埔里盆地,创造了“水蛙崛文化”,另有一群分支发展到浊水溪上游河谷,成“曲冰文化”。他们的分支,不一定由于人口的压力^[22]。

六 结论

台湾高山地区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经有颇具规模的聚落,曲冰遗址就是很好的例证。那时进入高山的先民,并非是因为受到族群的压迫或是平原耕地与猎场不足等原因。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有四:

(一)早期史前的先民在迁入台湾的时候,会尽量去寻求类似他们原居地的环境:喜于高山者,恒寻高山区域。

(二)族群社会结构之不同,往往所寻求的居地对生态环境的取向也不同。大族群的社会结构喜于平原或低地丘陵,小族群结构则喜于山区溪流河谷。

(三)对于疟疾的抵抗力弱者尽量住高山地区。海拔500米以上者,疟疾病的发生率即可降低许多;海拔1,000米以上,发生率几乎是零。

(四)即使是在史前人口压力不是很强的时代,族群繁衍的扩张行为仍然是一种动机。高山地区有着丰富的生态资源、舒适的环境和广大而安全的生存空间,这也是史前先民往高山地区扩张的原因。

(本文承吴春明教授提供东埔村相片,刘益昌教授提供最新田野考古资料,游桂香女士协助数论文稿处理,崙此致礼。)

- [1][21]陈正祥:《台湾地志》,《台北敷明产业地理研究所研究报告(第九十四号)》,1959年,第909、936页。
- [2]陈仲玉:《曲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田野工作报告(之二)》,1994年。
- [3]鹿野忠雄:《台湾原住民族と人类地理学の研究序说》,《地理学研究》第1卷第3期,1942年,第1~2页。
- [4][20]宫本延人:《高砂族的物质文化》,《民族学研究》1953年第十八卷第一、二号,第42页。
- [5][7]张耀琦:《平埔族》,《台湾省通志稿》卷八《同胄志》第三册,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65年编,第533~536页。
- [6]据台湾省政府农林厅水土保持局1990年《台湾西部地区治山防洪调查总报告(1981~86年度)》,台湾西部平地面积为960219公顷,即9602.19平方公里。详见报告第38页。
- [8][12][17]郁永河:《裨海记游》,《台湾丛书》第一种,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50年,第17页。

- [9]陈第:《东番记》,载沈有容辑《闽海赠言》卷之二,《台湾风物》第六卷,第三、四期,第24页。
- [10]哈波得(Albercht Herport)著、周学普译:《台湾旅行记》,《台湾经济史三集》,《台湾研究丛刊》第三四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5年,第125页。
- [11]C.E.S.著、周学普译:《被遗误之台湾》卷上,载《台湾经济史三集》,《台湾研究丛刊》第三四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6年,第38页。
- [13]中村孝志著、许粤华译:《十七世纪台湾鹿皮的出产及其对日贸易》,《台湾银行季刊》十卷二期,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6年,第131~147页。
- [14]村上直次郎原译、郭辉中译:《巴达维亚城日记》第一册,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0年,第49页。
- [15]Treistman, Judith M. Prehistory of the Formosan Uplands, *Science*, Vol. 175, No. 4017, 1972, pp. 74~76.
- [16]卫惠林等:《台湾土著九族户口统计》,《台湾省通志稿》卷八《同胄志》第一册,第一篇《综说》表一,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65年编,第27~30页。
- [18]王金茂、胡惠德:《疟疾成因与控制及其根除发展指向》,《省政研究发展丛书·卫生类(第二种)》,台湾省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1974年,第2页。
- [19]台湾总督府警务局卫生课:《台湾マウリア统计》,《卫生调查书(基本调查之四)》,1927年,第46、47页。
- [22]陈仲玉:《曲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田野工作报告(之二)》,1994年,第215页。

On the Prehistoric Settlement Sites of Taiwan Alpine Areas : A Case Study of Qubing Site

CHEN Zhong-yu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kong)

Abstract: There are more than 2,300 pieces of Prehistoric sites in Taiwan, most of them are located in the creek and river valleys and stretched into the alpine areas. The sites, with a scale of several hectares, are ethnic settlement sites. Scholars haven't reached an agreement yet on the reason why ancestors of Taiwan moved into the alpine areas. Some think it's due to the pressure of growing population, while others believe that to escape from some diseases is the main motivation. My opinion is based on four reasons: first, migrants always tried to seek the adaptable environment they had used to; second, ecology-oriented determination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ethnic groups; third, to flee from the miasma; finally, the expansion of the population.

Key words: alpine areas of Taiwan; Prehistoric sites; Prehistoric settlement; the Qubing site